

(上接第1267期)拜拜就拜拜,下一个更乖。(蓝领07,石匠)

上一个分手是因为我觉得她长得太丑了,就分了。(蓝领03,电话卡配送员)

网络中的恋爱同样难以长久,容易走向“见光死”的结局。蓝领受访者14在游戏中认识了一名女生,经过一年多的暧昧阶段,女生向其表白,两人正式交往。可是在现实中见过几面之后,两人选择了分手,原因是正式交往不如网上暧昧有趣。

两个人如果没有表达关系的时候呢,是可以暧昧的,男女双方都很享受那种暧昧的感觉,但是当两个人在一起之后呢,就要开始面对生活的琐碎事情了。之前没有见面,或者是没有表达关系之前呢,这些都是往美好的方面去想的,但是当你表达关系之后呢,你就会慢慢地发现现实和你想象的是有差距的,这种落差就让你觉得无聊。(蓝领14,玻璃厂工人)

部分新生代农民工采取游戏型的爱情方式,恋爱双方彼此都抱着玩玩而已的态度。还有部分人将爱情等同于激情,不愿意面对现实和经营爱情。其所构建的恋爱模式非常不稳定,更别提如何通过恋爱获得稳定的婚姻。

四、相亲悖论:新生代农民工难以通过相亲成家

从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自由恋爱的成家路径对于新生代工人而言并不如想象般的容易,而主观意识的抗拒和客观条件的劣势使他们在成家的另外一条路——相亲上也举步维艰。

1. 情不由衷:新生代农民工的相亲拒斥

对于农民工而言,相亲并不陌生。两位受访的老一代农民工都表示,相亲在她们那个年代是一条很普遍的成家途径。受访者娜娜(老一代工人02,自主经营)24岁开始相亲,当时在深圳的制衣厂工作,顺从家人的意愿辞去了深圳的工作回家相亲,中间相亲了有几十个人。

而另一位受访者玲娜(老一代工人01,环卫工管理层)在21岁就开始相亲。两位受访者都提到,她们在结婚时对于相亲的对象并没有非常深入的了解,如娜娜从相亲到确定结婚只用了三个月,其间也基本没有和男生出去约会,即使是男孩子约她,她也因为工作原因很少出去。而玲娜和相亲对象谈了半年,但由于男方在外工作,这半年里两人见面时间也并不多。

总体而言,由于信息不发达,工作时长及工作场所难以认识异性等原因的限制,相亲对于老一代农民工而言是很普遍的成家途径,他们在较小的年纪就开始接受相亲这种认识异性的形式,在适婚年龄甚至还会特意从外边辞去工作回家相亲。

然而,同样因为工作原因存在认识异性困难问题的新生代工人,却对相亲抱着一种抗拒的态度。在我们的访谈中,无论是超过普遍意义上的适婚年龄(指25岁)还是仅仅20岁出头的受访者,几乎都有被父母安排相亲的经历,然而他们大多数人都拒绝了父母的相亲安排,仅有的一名接受相亲安排的受访者也只是为了维持与父母的和睦关系,并不会考虑与相亲对象发展成男女朋友的关系(受访者11,汽修工人)。

有学者曾将其解释为新生代农民工对于父辈强权的反抗[19],但在我们的访谈中,即使是父母过世且从未被催促相亲的油漆工人,也对相亲持抗拒态度。新生代工人似乎天然地对相亲这种方式产生抗拒与排斥。而在追问受访者为何不愿接受相亲之后,受访者给出这样的回答:

只有恋爱到一定程度才能结婚。不然你说如果去相亲的话,(我)很排斥这些东西,没意思的。两个人都没相处过,你怎么能知道合得来还是合不来,要磨合一段时间。(蓝领03,电器厂品质管理员)

(去相亲的人)都是没办法找不到合适的,然后年龄也到了所以才去相亲的.....根本来不及培养感情,就得结婚了。(蓝领02,油漆工)

相亲的都没感情的,自己找的还是可以吧。(蓝领05,制衣厂工人)

在受访者的回答中,“感情”这一词被多次提及,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新生代工人有着强烈的情感需求,看重感情的培养与磨合。而在他们的认知中,相亲无法满足他们的情感需求。在他们看来,相亲结识的两人互不了解且相处的时间短,来不及培养感情。

另外,他们还把相亲看作一种走投无路且没有退路的选择,他们觉得选择相亲的人都是因为“没办法找不到合适的且年龄到了”才选择相亲的,而且相亲的结果一定是结婚,没有回旋的余地。

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对相亲迥异的态度反映出农民工阶层婚恋观的变迁,老一代农民工坦然接受“先婚后爱”的成

家模式,而新生代工人更青睐于“先爱后婚”的模式,“婚恋自由”的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融入农村青年具有传统色彩的婚恋观念中。

2. 身不由己:相亲市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排斥

(1) 相亲市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要求高
由于受到较为传统的农村适婚年龄观念的影响,相亲市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限制较严格,并逐渐形成相亲的年龄鄙视链。受访者提到,相亲市场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限制一般以25岁为划分标准,在25岁之前相亲的机会较大,而25岁之后则逐渐被相亲市场排斥。如果新生代农民工因此而不选择尽早进入相亲市场,这会大大影响他们能够成功进入相亲市场的概率。

在工作收入与经济层面,受访者普遍反馈要求很高,如稳定的工作,县城的房子、车和彩礼。在家庭层面上,相亲对家庭关系和家庭成员也具有一定要求,主要表现在“父母要年轻”“要独生子”“父母带孩子”。

现在的女孩子眼光都比较高,身高不能低于1米7,低于1米7连门槛都进不去。第二个是收入,要有稳定的工作,也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房子要县城里的,要有辆车,父母要年轻,还要独生子,要是有两个男孩子的话,女方会考虑到婚后压力比较大。然后彩礼都很高,压力很大。(蓝领07,石匠)

(2) 新生代农民工家庭支持不足

从家庭经济支持的层面来看,新生代农民工出身于农民家庭,父母大部分也是农民或农民工,家庭的经济收入比较低,无法为新生代工人提供全部的经济支持,如房子、车和彩礼等。在受访者自身经济条件不足的前提下,家庭的经济支持能够助力新生代农民工在相亲市场里略胜一筹。但是一旦父母缺乏能力,家庭支持不足就成为重要的掣肘因素。

像我这种,相亲就不用去相了。说句难听的,没人给你做媒。你家没有条件,人家给你做媒干嘛,白忙活人家愿意吗?人家做媒成功了有钱的。(蓝领02,油漆工)

从家庭生活支持的层面来看,父母的生活支持能够减轻和帮助下辈分担家庭的孙辈养育、家庭照料等责任。在新生代农民工经济状况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家庭成了他的“代言人”。但如果父母年迈或早逝,这就导致新生代农民工难以进入相亲市场。

3. 形同质异:相亲对于白领与新生代农民工的不同含义

新生代农民工对“婚恋自由”观念的崇尚似乎是解释他们抗拒相亲的完美原因。然而,在后续的调查中,我们发现拥有着前卫婚恋观念、对情感基础更为看重的都市白领却没有对相亲表现出更为强烈的抗拒,相反他们甚至主动接受相亲的形式,将相亲和恋爱同样视为构建亲密关系的途径,两者的相亲呈现“形同质异”的特点。

新生代农民工的相亲方式是基于强关系开展的传统相亲方式,他们的相亲紧紧依靠于血缘与地缘关系,受访者是这样描述农村相亲的流程的:过年放假回家,都是爸妈找关系看谁家女孩子,然后找个女方亲戚或者朋友说媒。(蓝领02,油漆工)

到了20多岁了家里肯定会催(婚).....家里的那些妇女没事就跑到人家家里去说谁家女儿没嫁人,谁家儿子没结婚。(蓝领06,电子厂工人)

相亲多由父母发起,相亲机会的创造依赖于亲戚朋友街坊邻里,相亲的过程还会遭受亲戚朋友的评头论足,诸如此类。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穿插在新生代农民工相亲过程中的方方面面,父母亲人的过多干涉让新生代农民工的相亲背负着沉重的压力,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他们没办法将相亲等同于自由恋爱,自由恋爱是从两个人过渡到两个家庭的,他们可以享有相对私密的二人世界,而相亲从初始就已经是两个家庭的事。

青年白领的相亲已经从强关系模式逐渐转变为基于弱关系开展的新型相亲方式[20]。相亲平台举办的各式各样的大型相亲会、专门针对都市白领设计创办的交友网站、雇主开展的未婚联谊Party、大型相亲交友节目等这些近年来都市大热的相亲方式更多是靠弱关系纽带连接,血缘、地缘关系的干涉相对较少,同时这些新型的相亲方式多以派对、网络配对等形式开展,青年白领可以以一种“交友”的形式,怀着一个相对轻松的心态扩大自己的交际圈,为自己的择偶创造机会。

新生代农民工依赖于强关系开展的传统相亲方式竞争激烈。已有研究发现,传统相亲的择偶范围距离大都在十公里之内的附近县城、附近村庄甚至同村[21],而由于农村优质适龄女性大多流入优质男性较多的城市,导致农村男女性别比失衡,这也意味着农村相亲市场会呈现“男多女少”的状况。

在性别失衡的相亲市场上,占据人口优势的女性多处于“挑剔”的一方,在“供不应求”的农村相亲市场,农村男性需要具备更优渥的条件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胜出,在我们的访谈中,受访者也对农村相亲状况进行了描述:

因为现在男孩子多,女孩子少,现在农村的女孩子都特别挑。女孩子看男孩子,看着还行就了解男孩子的人品,男孩子这个人怎么样,去你村子里打听你这个人有没有不好的传言。看家庭主要看家里有没有钱。看你父母怎么样,就父母年纪,然后就会说彩礼。父母健在的话,女儿嫁过去有父母帮着,女孩子就不会吃什么苦,以后生小孩了父母也可以帮着带,什么都不要女孩子操心了。男孩子挑女孩子,只要长得还可以就能结婚了。只要相中了,男方巴不得立马结婚,你不订婚说不定明天她就跟别人订婚了。相亲得靠抢,因为女孩子少啊。(蓝领02,油漆工)

相亲市场的激烈竞争逼迫着新生代男农民工不得不“出售自己”,相亲对于他们而言更像是一场困难重重的挑战。

新生代农民工与白领形同质异的相亲很好地解释了为何那些渴望成家却又从不主动出击的农民工会对相亲产生抗拒。就如制衣厂工人05,今年已经28岁的他从未有过恋爱经历,对于成家他自己也表示“有点着急”,当谈到择偶标准时,他表示“哪里的女孩子都可以,就是合适的就可以”,然而着急结婚且对异性的条件几乎没有要求的他却对自由恋爱和相亲都抱着一种“不情愿”的态度:“还没有谈过女朋友,没钱,就是没钱什么的,就是不想谈.....他们(父母)介绍过相亲,没有相过,不想去相亲,不知道怎么说,就是不想去。”

这位男工人对相亲及自由恋爱看似“毫无缘由”的抗拒在笔者看来是源于他对自身条件的不自信,无论是并不优渥的经济条件还是不善言辞、内向的性格,都让他感到“低人一筹”,相亲市场的激烈竞争与对方及自己父母亲戚的多重压力使他心生胆怯,外部环境的变化,使他没有了家庭和社区等外部支持,在婚恋的挑战中单打独斗。

五、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组建困境背后的社会根源

婚恋过程的“双重困境”折射了新生代农民工所面对的不同于老一代农民工以及白领阶层的社会环境。参与到不稳定和社会缺失的“世界工厂”的工作中,使他们的社会生活脆弱、封闭、不稳定,无法开展正常的社会连带关系,这导致他们在组建家庭的时候面临困境。新生代农民工婚恋和组建家庭的困境实际上折射的是其稳定正常生活所必需的社会系统的缺失。

首先,世界工厂劳动的不稳定,导致农民工一直处于漂泊的状态,无法稳定;而枯燥无聊的工作推动其热衷于追求刺激,助长了其游戏心态。

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一般具有以下的特点:时间长、内容枯燥。在工厂中工作的人尤其如此。在工作之余,还要忍受独自生活的孤独寂寞。他们会选择多样的娱乐方式来放松身心。

有受访者就认为“像十几、二十几岁的(打工者)喜欢玩很正常”。很显然,对于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来说,恋爱成了跟游戏一样的消遣。只要自身有吸引异性的条件,就可以开始恋爱“游戏”。

(我的工友)泡妞去喽,凭实力泡妞.....实力就是长相、钱包还有魅力。(蓝领07,石匠)

漂泊不定、频繁流动的生活和工作经历,使现实中的环境和人际关系的重要性下降,降低了他们花费精力维持形象的动力,亦瓦解了其经营自身形象和关系的决心。新生代农民工在青年时期就开始从大众媒介上了解爱情这座“秘密花园”,受其中爱情观念的影响,初步形成了自身的爱情观。

他们希望跟主角一样收获轰轰烈烈、美好的爱情。他们喜欢爱情热情似火的一面,却不愿意接受平淡如水的一面。当需要投入精力去经营时,有相当一部分人会放弃。世界工厂的不稳定劳动进一步助长了这样的恋爱观,当新生代农民工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抱有此种恋爱观时,就会对其他人产生影响,导致此种观念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广泛传播,形成“刚开始谈都是玩玩”的局面。其次,世界工厂的劳动收入无法支撑劳动者城市生活所必需的物质基础。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因为辍学打工,再加上缺乏专业性技能,导致工作可替代性强,晋升空间也很小。总体上看,不管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当前可支配收入还是未来预期收入,都不乐观。

在受访者13的工作转换描述中,从深圳眼镜厂到潮州陶瓷体力活,可以看出不管

是变换工作还是改善收入水平,都与文凭和技术相关。因为缺乏技术,尽管尝试过多次的工作转换,但他从事的内容都停留在陶瓷之类的体力活。

初中读完了就出去打工了.....那是一家眼镜厂,就是比较轻松,在那边做了几年,然后觉得那个收入不太理想吧。因为我们也没什么文凭,没什么技术。深圳那边没什么技术,去那边做事的话待遇也不高。到潮州之后,这边工作不稳定,有时候哪里有事就去哪里做。比如说找了一家工厂一年后没生意了,就得再换一个。就是工厂是不固定的,但是从事的工作内容都是在做陶瓷之类的体力活。(蓝领13,玻璃厂工人)

从经济消费的层面来看,新生代农民工对未来并没有规划,他们会为短期享乐而消费或者超前消费。在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收入相对较低的客观现实中,这种“月光族”消费观和消费行为更是为他们未来的“被拒于相亲市场之外”埋下了“没有存款”的伏笔。

受访者02说“平常也经常出去跟别人玩,也没想过存钱”“那个时候基本没有存下来钱”“以前都想休息”“我现在花钱也花得挺多的”,都能够反映出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观是以玩乐享受为基础的,他们会陷于短期的享乐消费而缺乏存款和未来规划的意识。

最后,参与世界工厂的劳动瓦解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根基,无法产生稳定的生活预期,无法产生基于现实社会的稳定的社会连带网络并依托于此营造社区生活。老一代农民工虽然也在世界工厂中工作,但是他们的生活依托于传统的乡村社区,这为他们提供了稳定的生活预期。乡村社会也给老一代农民工提供了充分的生活意义来源,诸如回乡建房、子女上学等乡村社会分层中的重要事件,亦是他们工作的奔头,成为他们在外吃苦耐劳、忍辱负重工作的意义的原点。老一代农民工在城市,通过与老乡聚居等方式,建构出相对稳定的社会连带网络,并营造相对稳定的社会生活。

但是新生代农民工面临从农村“脱根”以及在城市无法立足的“双重脱嵌”状况。尽管新生代农民工与乡村传统之间存在着多种复杂关联,但是普遍来看,传统乡村生活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重要性急剧下降,其所能提供出来的意义感愈加有限,留守经历、游戏世界、网络赌博等的卷入更加剧了他们背离乡村生活,降低了传统的家族延续等重要使命在新生代农民工内心中的重要性的。

高度的漂泊和流动让新生代农民工难以锚定他们的社会根基,在不断漂泊中稳定的生活预期缺失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安排难以形成稳定预期,而不稳定的预期又会导致双方容易在涉及金钱、工作等问题上发生争吵,难以维持稳定的爱情,也就难以通过自由恋爱这条道路来通往成家的大门。世界工厂的劳动体制对于劳工社会体系一直存在排斥效应,导致农民工无法开展正常的社会生活。

六、结论

不管是对美国还是中国的工人而言,有序地经历如上环节并贴上教育、工作、家庭等“社会标签”,标志着由社会认可的成年转型顺利完成,由此通向稳定的成年生活,构成了成年转型的经典路径。但是这样的画面面对今日的中美年轻工人来说都难以实现。

对美国工人而言,成年转型困境来自日益市场化的教育制度和非正规化的工作制度;对于中国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则来自不稳定的劳动以及世界工厂的工作模式下,参与劳动过程中产生了对新生代农民工家庭和社会生活的剥离效应,使新生代农民工难以开展稳定而可预期的社会生活。

对美国工人而言,传统的成年转型模式无法维系,令他们放弃了传统的家庭期望,转向以“治疗创伤—自我成长”为内容的个体化的新成年转型模式。对于中国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这种转型则显得更为艰巨: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并未放弃传统的家庭理想;另一方面,他们对这种理想的期望在这个现实中又无法实现,他们的理想与现实在这个不稳定的时代赤裸碰撞,只能被生硬切割。

一些新生代农民工在努力坚持,希望能够有机会进入经典的成年化模式,而一些人则可能已经在没有希望的过程中放弃了等待,类似“三和大神”的底层劳工即属于此。对于大部分“三和大神”来说,成家既是一个奢望,同时也是累赘。他们更享受“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的自由。由于放弃了成家的努力,他们也就失去了生活的动力,即便穷困潦倒、露宿街头,对他们来说也未尝不可接受。家庭以及社会对于他们而言,Z如韦伯笔下新教徒身上的沉重斗篷,已经悄然退去,从而遁入“无根社会”之下。(完)